

# 社会公共正义信念与发展合理化的价值逻辑

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西安 710119)

**摘要:** 发展是中国社会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主旋律。但究竟如何实现“好的发展”,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未解难题,严峻地考量着文明人类的实践心智。立足现代社会公共正义的治理逻辑,基于社会知识论、实践论、价值论和信念论辩证融通的立场,从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等自主探索和自我证成意义上,深刻反思和总结既具有地方性经验探索,同时兼具文明转型期普遍性范式意义的“中国发展”这一愈来愈引起全球关注的显性话题,是一个具有时代挑战性的艰深课题。中国社会实行市场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40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之公共价值与普遍正义立场,始终基于全体民众“美好生活”之最大福祉与期望,秉持“现代性”反思视野中“实践生存论智慧”的逻辑,创造性地开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有关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独特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依然处于“现代性困境”和迷茫中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兼具智识论与行动方略论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 公共正义;美好生活;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D 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8)04-0015-08

人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合理性”的难题。文明人类的优良发展实践,首先是一种基于优存信念的愈来愈丰裕的财富创造的过程,一种整体性意义上的健全的生存智慧和心智的理性建构和展示,同时伴随着与发展的理想范型和方向密切相关的优良社会“治道”方略的践行。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四十多年的社会体制、机制自主变革和制度自我完善历程,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思想、理论、文化及价值观创新实践,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立足现实国情,自觉地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提供了在一个自变量(人为改变的变量)、非确定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多的新全球化复杂信息系统场域中,社会认识论意义上的融社会发展实践论、历史真理论、人学价值论和合理中介论等为一体的成功的典型个案,实质性地克服了西方现代性文明的诸多病症,为人类的发展与生存实践贡献了新的具有前瞻性和方向引导

性的生存与生活智慧。

那么,中国社会向人类所贡献的这种具有文明新高度的融发展知识论和发展价值论于一体的新的实践生存论主张的核心和实质究竟是什么?中国的这种立足人类总体性生存关切意义上的新的文明发展立场,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会成为“多元现代性”的新的更具合理性的主张?后全球化时代现代性发展的独特的“中国方案”是什么?

## 一、发展合理化的新理念范型与“实践生存论智慧”出场的正当性

发展合理性问题所针对的,是启蒙现代性以来,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谓想当然意义上“发展就是天然合理”,以及一厢情愿意义上“能够做的就是应当做的”的发展主观性信念。“在它看来,只要是发展就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总比

收稿日期:2018-04-20

作者简介:袁祖社,男,陕西兴平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资助项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5ZDC004)。

发展得慢好。总之,发展天然就是好的;发展本身没有好与坏的区别。”这种发展理论只推崇“如何发展”得“科学”,而对于“发展究竟为了什么”一类的价值问题,却付之阙如。<sup>①</sup>这一信念及其实践,引发了现代发展实践中的深刻的“价值危机”和道德生活危机。

任何一种发展,必然内含着鲜明的发展价值观的关切。发展价值观的有无和合理、先进与否,决定着发展实践的质量和发展的品质与境界。在现代社会中,究竟立足何种立场评判某种发展模式的优劣,历来存在激烈论争。对发展价值观的内蕴,有学者指出:所谓“发展价值”,就是表征和指向的特定的发展实践、发展过程的“理念”“原则”和“尺度”,决定着发展质量、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sup>②</sup>对发展之合理性价值观的实践认知,始于对“理性主义发展”观之深重弊端的再审视。启蒙以来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几百年来,“西方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现代发展观最根本的危机是发展问题上的价值观危机。当代世界之所以会出现人的‘生存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的发展模式只有动力机制(如追求无限占有、消费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自由竞争)而没有发展的自我评价机制。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即发展的技术问题),而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的目的论和价值论问题却漠不关心。”<sup>③</sup>

传统理性发展观的核心主张,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抽象理性主义信念指导下,视社会发展为有机体方式的单线进化;二是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想当然地认为依靠科技理性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sup>④</sup>针对“理性主义发展观”的上述弊端,有学者指出,现代性观念主导下的启蒙实践,崇尚理性主义信念,马克斯·韦伯所

警告的“工具理性主义”及其价值观甚嚣尘上,关注人自身的生存权利、价值和意义以及精神生活追求(境界)的“价值理性”逐渐被遮蔽。这一努力导致现代社会结构、功能方面的秩序化、活动的效率化等多重变革结果的发生:一是社会组织上“法理社会”对于“礼俗社会”的全面取代;二是政治上科层制度的确立;三是在经济上“算计原则”支配一切,经营过程更加精打细算。“可以说,这是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合理化,即理性地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考察手段在实现目标方面的效率、效用。在这样一种合理化的模式中,人们较少考虑目标本身对于人类是否有价值、有意义。换言之,这种合理化不给人们提供关于生活的目的、意义、价值的解释。”<sup>⑤</sup>

由上不难看出,传统的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技术理性”本位的。“技术理性”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立足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sup>⑥</sup>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坚定地秉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价值哲学宗旨,坚定地遵循、创造性地运用经典作家唯物史观的真理和人学辩证法(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直面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困境,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毅力和智慧,展开了新一轮全面、彻底地改变一个曾经无比辉煌、伟大的东方民族生存命运和生活面貌的伟业,为文明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了一个具有重要示范性的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突出特征的中国典范,其对于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制度、文化以及生活信念的影响,无疑是深刻、深远的。改革开放40年,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全

① 刘福森:《价值迷失: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观的“走火入魔”》,《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29页。

② 贺来:《“价值清理”与“价值排序”——发展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第14页。

③ 曲红梅、刘福森:《一种反生态的价值观——西方现代发展观的价值危机》,《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90页。

④ 朱春辉:《理性主义发展观与非理性主义发展观探索》,《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62页。

⑤ 王晓升、曾雪娟:《浪漫主义发展观批判》,《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5页。

⑥ 赵建军:《超越“技术理性批判”》,《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07页。

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历程,伴随着社会发展观念、模式等的深刻变革。客观地讲,在发展价值观、发展实践模式以及发展的社会目标等问题上,我们一开始并不是很清晰、很理智,有过迷茫、有过挫折,是在艰难探索中曲折前行的。形成、确立真正具有文化和价值观标识意义上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的中国方案,中国政府、中国社会最具创新性的有关发展的知识社会学意义的成果,在于理智、审慎地反思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和“浪漫主义发展观”(将发展的目标仅仅理解为人性的自我完善,主张社会的发展不应是理性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而应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实现,应依赖于非理性的本能、情感、欲望等。)基础上,作为发展之价值合理性方案的中国智慧、中国立场和主张的集中体现的“实践-生存论智慧范式”的自信出场、坚定践行。

“实践-生存论智慧”本位的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发展观念源远流长。其最原初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学者洪汉鼎考证指出,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区分了纯粹科学、技术或应用科学和实践智慧三种不同的知识类型,指出:(1)实践智慧作为一门特殊的知识类型,它既不同于纯粹科学,也不同于单纯的技术或应用科学。希腊文所谓实践智慧,意指一种实践的知识或明智考虑的能力。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强调,实践智慧指知识和德性的统一,主张“德性就是理性(logos)”,理性即知识,所以德性就是知识。简言之,实践智慧就是一种有德性的知识或有知识的德性。(2)实践智慧是生命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使人趋善避恶。依亚里士多德之见,“实践智慧是一种与正确计划相联系并坚持正当行为的践行能力,而这种践行的对象是那些对人善与不善的事物,因为制作在自身之外尚有别的目的,但践行却不是这样,因为良好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sup>①</sup>(3)实践智慧考虑的乃是对人的整个生活有益的事。亚里士多德

指出:“所谓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能正确考虑对自身的善或有益的事,但这不是就部分意义而言,如对于健康,对于强壮有益,而是就整个意义而言,指对于整个善良而幸福的生活有益。”<sup>②</sup>由此可见,实践智慧所关心的乃是在人的具体生活中去追求对于人类整个生活有益的最大的善,因此它不是一门光求知识的学问,只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去实现最大的善才是其最终目的。<sup>③</sup>学者杨国荣先生分析了“实践智慧”概念的复杂演变,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时曾指出,实践智慧既体现于了解何者对自我及一般意义上的人有益,又涉及‘合乎逻辑的、真实的能力形态’,并以此‘为人的利益而行动’。与利益相关,意味着实践智慧以价值的关切为题中之义,也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指向‘一种好生活’,并关乎人‘总体上的有益生活’;合乎逻辑体现了理性的品格;‘为人的利益而行动’是与价值追求相联系的实践活动,它以作用于世界并使之合乎人的需要为目标,其中内在地包含改变世界的要求”。因此,“实践智慧”的较为准确的当代内涵在于:概略而言,“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融合于人的现实能力”。以成己与成物(成就自我与成就世界)为指向,“实践智慧联结了对世界的解释与对世界的变革,展现为‘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与‘应当如何做’的理性追问的统一。它在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的同时,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的内涵”。<sup>④</sup>

以“实践-生存论智慧”的立场观照当代社会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其深远的启示性意义在于,一方面,“实践生存论智慧的新发展观”区别于启蒙现代性之所谓抽象理性观念所主张的单一的、单线条的进步论逻辑的关键,在于其强调并立足的是作为整全性的人类生命本

①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页。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第25—27页。

③ 洪汉鼎:《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9页。

④ 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4页。



身、活动本身,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谓“过程的逻辑”。在此种新发展观看来,合理意义上人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所追求、所造就、所致力于实现的,是对启蒙理性之进步论意识形态叙事范式的超越,是作为发展主体与对象性世界的连续的、内在的全生态链的维持和形成。另一方面,作为对“实践-生存论智慧”的践行,中国特色的发展探索及其成功表明,发展理念进而发展合理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人类历史演进的长时段,将其置于文明形态转型与变革新时期,着力呈现特定发展理念的实践的知识论意义,从生存智慧本位之中国方案的高度,确立发展理念、发展实践、发展模式的历史-实践-制度以及文化价值四位一体的分析、诠释话语,切实提高人类生存的境界。

## 二、发展合理化的优良信念理据及其公共价值引导的制度正义实践

问题成堆的西方现代性文化与价值观念主导下的制度实践,充满了发展的悖论与困境。这其中的一个最为显见的事实是,狭隘的“现代性发展”最终造成了“制度的发展性依赖”和“文化、价值的拟发展性解释”。高歌猛进、一路凯旋的“发展”实践在将自身愈来愈“抽象化”“普遍化”的同时,变成了唯一具有至高无上的“合理性”的事实本身。

经历了现代化实践无法避免的“发展异化”及种种“发展反人性”的惨痛经历和深重体验,现代文明社会主体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发展的确是人类生存与生活之必需,但是,发展并不是人类生存与生活之全部。同时,单靠被片面理解了“发展”,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生存与生活之全部难题。整个宇宙自然、整个人类共同体本身,向来有着比单一的纯粹的发展更高的、更优越的目标和价值,需要人们去关注、尊重与呵护,值得人们去追求与践行。这就是说,发展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事实,而是内蕴着深刻而鲜明的人类意义上的价值关切。价值对于发展不是外在游离,而是内在嵌入的。合理的发展实践一定伴随着对

于符合社会进步信念的优良的公共价值观的认知和践履。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同时是对社会公共价值的传承、创造和矫正,是普遍社会公共正义的逐渐实现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判断一种发展观念是否优越和先进,首先看其核心理念是否表达了对公共生活难题、对社会长远利益、公众利益的关切,是否反映了社会良知,是否致力于一种普遍的社会公正的达成;其次,要看这种观念是否立足于对于社会最广大民众基本的生存权利、切身利益的考量,其结果是否促进了最广大民众福祉的最大化,是否持续地增进了他们在经济社会普遍繁荣的境况中不断增长的“获得感”“满足感”“尊严感”和“体面感”。

客观地讲,与特定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相关的社会公共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特定社会、特定发展主体所自觉认知到的。公共价值所以会成为发展实践的必要参数和内生因素,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基于发展实践之自我反思和批判的结果。一般而言,与健全发展相适应、相一致的社会公共价值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在发展实践中如何得到恰当的呈现,既有发展实践本身的自然生成,更离不开发展主体的自主建构。以西方社会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一种旨在辩证地扬弃传统发展思想,重建“新的经济发展观”进而确立新的发展观的思潮开始在欧美知识界兴起。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国经济学家F. 佩鲁、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以及大名鼎鼎的罗马俱乐部的D. 梅多斯和M. 梅萨罗维克等。以法国经济学家、人文学家佩鲁为例,其在产生了广泛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的《新发展观》中首先坚定地表达有关发展的新的卓越见解和鲜明“立场”:(1)“新发展观”的实质。发展是“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佩鲁明确指出:“我研究的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此一新的主张既构成新发展观的“中心”和根本性“目的”,更是人类未来发展之最深刻、最持久的“动力”。①

①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2) 这一“发展的人本性”视野、方法的特殊性在于,其与统治者和剥削者极力宣传并让人相信的、鼓动全部居民奴隶般、机器人般的劳动是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最有力和最迅速的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sup>①</sup>紧接着,佩鲁将思考的触角深入到发展的深处,关切“振兴与进步的社会”的主题,尖锐地批评了就以往“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从没有密切地关注人这点而论”,“人就是一个不随光阴流逝而变化的人,只能是个抽象的概念。应把这种概念从现实中清除出去”。佩鲁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其可资借鉴的发展方略在于:“必须就生活条件、文化和政治意志的锻炼提高个体和群体的标准”<sup>②</sup>,“以促进共同体内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sup>③</sup>同样,针对明显“非合理化”发展理念及其所带来的、人类发展方向的迷失等生存困境,当代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深刻地指出:“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sup>④</sup>

发展的合理模型和价值理性,表征着有关发展实践与对象世界的良性关系质态。显然,不断加速进化和进步的智能化人类并不缺少发展的基础性知识、发展的系统化理论以及近乎成熟的发展的实践模式,人类所缺少的,是基于合理性模型的发展价值观。优良的价值发展观的胜出,是发展实践相关的多项指数、函数综合加权的结果。发展理念、发展价值观以及发展实践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或者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取决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对其价值取向来说尤其必要的人道关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贯穿着一条鲜明的思想主线,即对启蒙以来西方

文化价值观念和制度化实践所表征和主导的发展观念的深刻反思与全面变革,努力寻求、确立发展道路的“中国逻辑”“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体现着一个觉醒了的、行动和探索中奋进前行着的民族自主和平崛起的实践逻辑。面对正在向纵深拓展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理论的思考和研究所需要进一步探究的主题,不是依照传统对于研究对象的思考所因袭的基于特定结果性事实所展开的非批判性的简单叙事和比附的方式,而是遵照社会性认知的生成逻辑和图式,关注、澄明中国特色的发展价值观何以可能,其恰当、合理的出场逻辑,普遍性示范性场域的生成问题。

道理不难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理化的发展实践以及发展合理化目标的实现,秉持的是社会公共价值所追求和承诺的“公共正义”的理想逻辑。社会发展实践中公共性信念的有无,对于特定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生活形态中发展合理性与否的公共价值评判,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某种发展文化、某种发展哲学之知识论立场和普遍性文明境界之高下的核心尺度之一。当然,在发展的实践价值论的意义上,关键并不在于作为某种发展实践之深刻根基的制度和思想文化是否有公共性因素特质,而在于其如何看待、如何对待发展的公共性诉求,如何让发展公共性以如其所是、如其所愿的方式得以或恰当、或充分地实现,从而让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活实践中的公共性份额与总量以累量增进的方式,实现最大化、最优化。中国社会从1949年以来尤其是进入社会全面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以来,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观念强势主导的新旧全球化的复杂场景,以及与之相互呼应的多元思想价值观念的冲击、挑战,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智识性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始终坚持在发展宗旨与目标、发展主

①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第151页。

②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第20页。

③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第22页。

④ 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徐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体和目的之实质问题上“人民利益根本性”和“民生福祉最大化”的信念;其二,始终坚信优良的发展实践,一定是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前提的;其三,始终强调合理的、正当的发展理念,一定既具有民族性品格和利益诉求,又具有世界性品质和普遍性关切。

### 三、发展合理化与新发展理念之 “美好生活”本位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类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表明,在人类有序进化的历史上,“生命”“生态”“生活”之间良性的、和谐的内在有机关系的建立、保持和维护,是现代人在实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目的过程中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实践伴随着对作为生命整体的人类社会整体和个体之自然生命生态、社会存在生态以及精神生命生态秩序和内在规律的尊重,伴随着对优良制度的保障的吁求和变革实践。

任何一种发展观念和发展实践,任何一种与发展相关涉的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与体验的达成,都是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中并依托此一框架得以展开的。发展及其所承诺的美好生活的愿景,从一开始就是依照“制度性事实”,需要制度的规制与介入。特定制度的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特定发展范式的选择,规定着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相一致的健全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合理的、有效的发展实践与生活价值观,追求和实现的是其与优良制度信念的耦合,是对此一制度优越性和先进性特质的证成。同样,面对明显是不合理的发展理念、发展行为和畸形的生活方式,同样需要站在整个人类的福祉上,旗帜鲜明地展开反思、批判和矫正。问题是,在发展与生活(财富创造与民生福祉改善)的关系上,现代社会的治理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于,“制度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非均衡的政治市场上,哪一个利益集团处于有利地位,哪一个利益集团就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制度的选择,从而形成有利于本利益集团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所以,要形成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必须要

有相应的政治市场保障。任何国家都有利益集团,而只有均衡的政治市场才能把利益集团对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选择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sup>①</sup>。

享受一种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水平相一致的美好生活,是现代社会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发展方式严重阻碍了这一权利的实现,更在社会价值观层面严重扭曲了人类对于真正的、真实的美好生活的理解。“美好生活”不是一个抽象的承诺和空洞的目标,而是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与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多方面理念、范式和实践等多重改变的实际发生,以及由此改变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活生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态的美好体验的发生。合理的发展是以进步人类所吁求的“美好生活”为本位、为指向的。发展为了生活,发展是通向美好生活的手段,是现代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什么时候人类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是围绕此一目标和方位得以展开的,什么时候人类的发展实践就能够顺利、健康;反之,什么时候人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不断地违背、破坏上述方位和目标,什么时候人类的发展实践就会迷失方向,陷入困顿,带来发展的异化和灾难。

“美丽世界”“美好生活”本位的发展合理化,呼唤人类生存价值本位的公共性文化立场和公共价值情怀。新全球化时代,进步人类的发展实践和生存与生活形态,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历经艰难曲折所发现、所获得的“发展文明”成果以及符合人性的生活信念,如果得不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类的捍卫和守护,就会有被吞噬的危险。如何建立发展与制度之间良性互动的合理模型,以优良制度的示范效应引导和矫治业已偏离文明正道的错误的发展观念,是当代社会的难题。当今时代,国际社会普遍遭遇全球化以及反全球化实践难题的困扰。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全球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学科领域,先后密集地提出了许多带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应对良方,一定程度和

<sup>①</sup> 卢现祥:《论制度的正义性》,《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第5页。



意义上对全球化难题的症结给出了有限合理性解释。作为国际社会一分子,中国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坚定地推行并不断全面、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实践,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最为有力、最为强劲的推动力量。不仅如此,中国社会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对于支配、引导旧式全球化实践的体系化价值理念的深刻、持续的反思、批判和矫正,对于“美好生活”本位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新质的发展理念、发展范式、发展方略、发展价值观与发展道路等的理智探索和成功实践。这无疑是中国对于新全球化愿景和未来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合理化发展观念及其美好生活逻辑,彰显的是特定时代民族国家社会建设意义上优良的“公共治理”逻辑。有鉴于现代性发展观念和实践的种种弊端,以及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的中诸多弊端,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有效地借鉴现代治理和善治的理念,立足发展观之中国逻辑与发展实践之“中国形象”重塑的新历史理性视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之过程与制度、道路优越性、思想理论先进性有机融合,创造了民族复兴伟大奇迹中的“治道”新模式。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实现“发展”“制度”及其与“美好生活”目标三者的统一,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式公共治理的复合主体格局——政府引导、社会主导、市场协同、第三方积极参与格局的形成问题。此乃中国式公共治理的难题:即面对一个事实上的多元利益格局社会,如何将作为现代社会基本构成的作为复合而非单一化行为的“政府”“社会”“市场”“第三方”等有效的整合,借此形成一种“多相耦合”“有效联动”的系统框架。这其中,任何一方的单独主导的冲动或者任性(率性)而为,都是有违“治理”的价值本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式公共治理一定是“整体性”的,单靠社会生活领域的某一个方面的单独行动,不足以实现一场真正触动不尽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彻底治理。二是基于“普遍正义”的中国式公共治理的实践逻辑——以“行动”求“改变”何以可能。着眼于国际社会声

势浩大的普遍治理与善治实践,以及其所提供的日益丰富、日益成熟的地域性地方性治理经验,当代中国式治道实践,并不缺少应有的理论资源,不缺少必须进行全方位治理的社会价值共识,不缺少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治理新路的勇气,唯独缺少的是认准目标、确定路径、坚定不移、大胆实验、典型示范引领而后成功的能力,需要的是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大胆开展治理实践中的“决断力”和“执行力”。

对于人类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的综合性、全面性、深刻性变革而言,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而言,在制度理性和制度价值指导下,社会发展合理化实践的实质性转折的标志,在于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确立。新发展理念旨在超越(破除)“发展与生活”的制度悖论的幻象,切实提高发展水平与质量,努力推动人类发展迈向新境界。有学者指出:“它是改革开放近40年,对于发展问题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关于发展观念的又一次理论创新。新发展理念作为发展理念的新形式,具有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整体性、历史性等五大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社会性质。”<sup>①</sup>新发展理念不仅是美好生活的理论指针,同时更在全局意义上统领、引领美好生活的实践。一方面,新发展理念在理念建制意义上,清晰地勾画出了一幅有关美好生活何以可能的理想图景。此处所谓“美好”,是有关、针对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发展实践在发展本体、发展动力、发展目标等方面新努力的价值吁求。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同时意味着未来中国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对于美丽新世界、美好新生活的自觉创制和自主创造,必须围绕“美好生活”的各项要素,重新设计新的评价指标、评价体系,从而逐渐达成一种有关发展之总体性效果的更为科学、更为客观、更为全面、更为权威、更具前瞻性的新的价值尺度。

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内在统一的意义上

① 陈昕:《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特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1月29日。

讲,制度公共正义基础上的新发展理念和美好生活的内在关系的确立,意味着“美好生活”将会成为未来人类世界以及中国社会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全面发展进步的重要的参数。这同时意味着,一种发展理念是否优越,是否具有前瞻性和典范性,是否具有感召力和生命力,是否能够得

到人们的认同,一种发展实践是否成功、有效、合理的评判尺度必然是:是否切实促进了整个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完善,实质性地变革了人类的生存范式,提升了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的质量、品质和境界,是否与“美好生活”的价值旨趣内在一致和深度契合。

## The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Public Justice and the Value Logic of its Development Rationalization

Yuan Zus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them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reform, opening up and modernization. However, how to achieve “good development”, as a global unsolved difficult problem, has severely tested the practical mind of civilized human beings. “China Development”, as a dominant topic which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global attention, is a difficult and profound subject with the challenging of epoch significance, because it is rooted in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public justice in modern society, and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and integrated position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theory of practice, theory of value and theory of faith, and also because it is both a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summary of the exploration of local experience, and a paradigm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n the period of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nd self-verification of its road,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it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globalization and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position of public value and universal justice of Marxist practical materialism, and based itself on the greatest well-being and expectation of the entire people, and upheld the logic with the wisdom of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in the horizon of modern reflection. China has also creatively unfolded its unique China Plan and China Wisdom about st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its practic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d those later-modernized countries which are still in a dilemma of “modernity”, with an enlightenment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sense of intellectualism and operation-planning theory.

**Key words:** public justice, good life, stat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刘曙光)